

《老殘遊記》的域外知音

——德國漢學家屈漢思* 博士——

訪問整理：張堂錡*

現年四十二歲，任教於德國慕尼黑大學東方語言與文化研究所的屈漢思博士，是首位將晚清著名小說《老殘遊記》翻譯為德文的著名學者，也是國際間研究太谷學派的先驅。由於海外、大陸、臺灣等地的學者，對太谷學派幾乎完全陌生，相關的資料也隱晦難尋，因此，他的研究成果格外顯得難能可貴；尤其根據他研判，認為《老殘遊記》就是「太谷學派傳道書」的論點，更是迥異於傳統學者對劉鶚及《老殘遊記》的理解。無疑的，他的發現已為這部名著的研究另闢了一條新路，雖然尚非定論，證據也還不足，但已著實令人刮目相看，且深受漢學界重視、期待。

屈漢思於四月初來臺，預計停留二週。他此行是專為搜集有關研究資料而來，因此大部分的時間都留連於中研院、故宮博物院的檔案館裏，埋首於史料原典中。對他來說，如何撥開太谷學派重重的迷霧，還原《老殘遊記》真實的面貌，已成為研究生涯的重心及個人學術生命超越的標竿。

正因為他在這方面的學術探索走在世界的前端，中研院文哲所遂在他短暫的停留中，邀請他抽空舉行一場公開演講，講題為「從老殘遊記與太谷學派談起」。本刊在他演講之前，透過文哲所所長吳宏一教授的推介，進行了一個多鐘頭的訪談，從家庭生活、求學歷程及研究心得，都做了剴切而精到的說明。雖然週末早晨的臺

* 屈漢思先生 (Dr. Hans Kühner)，德國慕尼黑大學東方語言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 張堂錡先生，中央日報副刊編輯。本文轉載自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十六日中央日報副刊。

北天空一直不斷落雨，早春的微寒也隱約地沁入心脾，但在熱騰騰的咖啡香氣、主人誠懇、儒雅的招待下，一股暖意馬上在彼此言談笑語中升起。

「我的中文說得不好。」他有些腼腆地說出這句話，可是說得如此字正腔圓，反令人有中文造詣不可小覷之感，果然，在往後的談話裏，除了速度稍慢外，不論思路、措辭與發音，都充滿道地的中國風味，適時的引經據典，更顯得流利自然。既然語言溝通無礙，我們寒暄之後便立刻進入主題。話題從他的求學歷程開始說起。

十九歲離家，藉旅行認識東方文化

「西方文化中有一特點，即年輕人都想與家庭分開，自謀生活獨立，我可能也是這個動機而離開家。我住在德國西南的小鄉村，求學後才到大城市。剛上大學不久，我就決定要到東方去親身遊歷，欣賞東方文化之美。1969年，我十九歲，正在唸大三，但我已決定離開，於是我一路上從巴基斯坦、印度、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旅行到臺灣，趁機參觀了東方文化。」

他解釋說，大概是當時許多人對西方文化的矛盾很敏感，心中苦悶，想尋找另一個出路，接觸另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少人對西方模式不太滿意，而整個大思潮則是對中國文化、印度佛教、禪宗感興趣，於是他也受了此一思潮的影響，而對東方文化產生一股親炙的渴望。

屈漢思來臺求學，在師大國語中心學習中文一年，每天練習寫字、讀書，並到南部、山區到處參觀，回憶起那年的情形，他說，彷彿只剩下了寫字與走路二件事而已。一年後回德國，他又重複了一次來臺的路線。在德國，敏感的屈漢思感到氣氛劇變，1968年政治運動開始，學生活動也很積極，很多人不再談中國古代文化，而大談近代政治，對中共那一套有興趣，共產主義組織在大學裏活動頻繁，整個氣氛都改變了。他也因參加學生運動而放棄了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興趣，只對中國當代的政治發展有興趣。

「現在來看，那是一項錯誤，但從我個人發展來看，未嘗不是一種幫助，我得到了不少經驗。」

積極投入學生運動的屈漢思，曾被抓過，但並未入獄，現在回想起那時狂熱、盲目的無知歲月，他笑著說，那是很年輕時候的事了。二、三年後，他警覺到自

己生命盲目流失的可怕，遂申請到倫敦大學「東方暨非洲學院」去研究中國現代政治，以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影響為主，回到慕尼黑大學後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馬克思主義二〇至五〇年代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取得博士學位。

「我從1968年到77年拿到博士學位，共有八年時間都在校園裏，因為一直都是申請基金會獎學金，於是畢業後想找一份工作，而申請到上海師範大學教德文。」

費時五年，以一人之力完成《老殘遊記》德譯本

1977年12月，他以「外國專家」的身分前往大陸，在文革之後，他們可說是第一批進入大陸任教的外國人，因此遭到嚴密監控，不准騎自行車從學校到上海市區，必須有幹部或翻譯陪同始可；學生到他家也必須二人以上，事後還必須寫報告。這種生活令他難以適應，教了二年多，又回到慕尼黑，在相當於中研院的「馬克思布蘭克學會」研究機構，負責與中國大陸的學生交流、科技合作等工作。這份工作仍非學術，而是管理，三年後，他覺得自己的性情還是屬於學術，於是申請到Bochum 大學研究中國近代科學史，探討西方科技進入中國的過程。二年後發表了一本學術著作，關於近代科學從1928到1982的發展，同時也在大學一位教授的建議下，著手翻譯《老殘遊記》為德文。從1985年開始，到1989年出版，歷時五年，如此龐大的工程，他一人獨立完成，投注的心血與艱辛可想而知。因為翻譯《老殘遊記》的緣故，他發現了太谷學派。

「其實，這部小說我早就看過，覺得跟其他清末小說不同，劉鶚這個人，在思想上較自由、開放，個性剛強，他有許多跟古人不同的見解，深深吸引了我。尤其當我發現他是太谷學派的門人時，更是大感振奮。翻譯過程中碰到的困難當然不少，但因我在八六年又回到大陸，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教翻譯，於是請教一些學者，如將《老殘遊記》翻譯成法文的盛成老先生即是。」

屈漢思認為，劉鶚一生信仰太谷學派思想，是該學派第二代和第三代傳人的門弟子。《老殘遊記》最早是用筆名「鴻都百鍊生」出版的，採用這種方式，作者可以公開地傳播他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同時也可以宣傳當時被攻擊為異教的太谷學派思想，因此，他很贊同有人將《老殘遊記》視為「太谷學派的傳道書」。

到底太谷學派的主張與歷史如何呢？研究此一議題已三年的屈漢思依然持保留的態度，他表示，很多問題都未成定論，值得深究的地方還很多，不過，太谷學派

的大概歷史他尚能掌握。他說，此一學派的創始人是周谷，號太谷，活在嘉慶、道光年間，1832年死於揚州。死後分成二派。北派領導人是張積中，十九世紀五〇年代因揚州遭太平天國動亂，遷到山東，在黃崖山區建立了小型的公社組織，和家屬、學生們讀書、耕地，同治年間人數多達一萬人，參加者百姓、官吏均有，連官吏也被要求耕田、勞動，因此這到底是傳統儒家學派，還是教派？未成定論。主要原因是他們的著作都未公開發表所致，這是肇因於同治五年，山東巡撫派兵圍殺了二千多人，這個學派遂成爲非法組織，因此幾位主要傳人的手稿都不敢發表，直到現在，只有劉鶚的兒子曾發表《李龍川詩集》一小冊而已。

南派的領導人是李龍川，活動地點在江蘇，但此派沒有繼續發展。後來張積中的一個學生在黃崖山屠殺中死裏逃生，到南方與李龍川的學生一起在蘇州建立書院，這書院的經費主要是靠劉鶚及上海富商、官吏資助，直到民國十五、六年還存在。

張積中與李龍川同爲此一學派第二代傳人，第三代是黃葆年，他們都有「遺書」手稿，屈漢思在大陸上偶然得見，加深了他深入探究的決心與興趣。至於此一學派的特色，他目前仍在思索，只能大略描繪一些輪廓：

研究太谷學派成就可觀，但因缺少同好而時感寂寞

「他們主張親自下田，自給自足，這一點可能接近『農家』，但在主要傳人的『遺書』找不到佐證。此外，他們特別注意修身過程，認爲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家傳統後來中斷，宋儒繼承了其中的一面，太谷學派則繼承了另一面，注重內聖工夫，這一點有待研究。他們也不同意宋理學家們對佛、道教的否定，而認爲佛、道，甚至包括基督，雖與儒家路數不同，但目標則一致。這個觀點早期也有，如明末福建莆田的林兆恩就曾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張，因此有人認爲太谷學派是林兆恩後來的學派，但因其間相距兩百年，找不到居中聯繫的資料，因此有待商榷。如果從思想上看，我認爲太谷學派是比較接近儒家的。」

因爲資料難求，加上研究人少，屈漢思雖然在這方面做得興致勃勃，但也不免有寂寞之慨。現居美國的馬幼垣曾於六〇年代在臺灣寫過一篇有關劉鶚與太谷學派的文章，但根本未見過手稿資料。此次來臺，他在故宮、中研院找了不少線索，例如當時山東巡撫的奏摺，可查出張積中在山東活動情形，地方縣志也可得知一二。

不久，他將赴大陸參加一項有關太谷學派的學術會議，一些年紀較大的學者，甚至與太谷學派有點淵源的人也會出席，屆時可能會有新的發現或研究成果發表。

從1989年夏天自北京返回慕尼黑大學任教後，屈漢思自認才真正開始自己的漢學研究生涯，因為以前的工作似乎都算不上是漢學研究，不過，也正因為他在東方豐富的親身經歷，使他在這方面的研究上有較寬濶的視野與正確的認知。他認為，西方傳統漢學研究的成就固然可觀，但大部分漢學家對中國社會缺乏真正接觸，無法真切了解中國人的思想概念在中國傳統歷史、思想、社會上起了什麼具體作用，只是把這些概念當作抽象化事物來看待，這一點恐怕並不正確。而他慶幸的是，年輕時在中國的東飄西盪，使他避免了這一缺失。

這幾年來，他一方面在大學教書，一方面專研太谷學派，這已成為他漢學研究的重心。此一式微且鮮為人知的清末學派，因為他的研究而在國際上漸受重視，身為太谷學派的門人，劉鶚地下有知，必將深深感謝這位來自德國的域外知音吧！